

国内有关战后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研究概述

郑佳

摘要：作为一个曾经饱受殖民侵略，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均被打上殖民烙印的新兴民族国家，马来西亚的民主政治探索之路走得并不平坦，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从仿效西方议会民主转向威权政治再到民主转型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围绕马来西亚政治、经济以及华侨华人等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近年来，随着中马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领域的不断拓展，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对马来西亚政治问题的认识和判断能力。对比时代及社会提出的新要求，我们的马来西亚政治问题研究还存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较为单一、研究内容有待拓展、理论化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国内学术界对战后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研究的基本情况，对于我们厘清马来西亚族群、宗教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进一步总结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规律与特点，进而展望未来的马来西亚政治发展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马来西亚；威权政治；民主转型；族群关系；伊斯兰教

收稿时间：2021-10-25

作者简介：郑佳（1986~），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东南亚研究》编辑部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东南亚政治问题。

马来西亚的族群问题、宗教问题是国家政治生活领域的核心问题，深刻影响着马来西亚政治发展走向。独立初期，马、华、印三大族群政党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组成族群政党联盟。20世纪50、60年代，马、华族群矛盾在议会民主制的制度框架下找到了新的出口，围绕议会选举展开的族群政党竞争加剧了政治上的紧张态势，并于1969年爆发了建国以来首次大规模族群暴力冲突事件，成为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70、80年代，巫统领导的国民阵线（简称“国阵”）政府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有效巩固

巫统执政地位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马来人在各领域的优势地位。随着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马、华族群经济差距逐步缩小，族群关系的紧张态势得到缓解。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马来西亚社会变革及政治转型加速演进，政府制定了惠及全民利益的“新发展政策”，进一步缓和了族群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政治领域的族群色彩逐渐淡化。

从马来西亚政治的演进轨迹看，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将前殖民宗主国遗留的政治遗产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民主与威权并存的特殊政治体制，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秩序的稳定。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关注马来西亚独特的政治发展模式，从不同角度予以分析解读。国内学者对战后马来西亚政治发展规律、特点进行了细致的总结分析，形成一大批有影响的论著。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国内学术界对战后马来西亚政治发展情况的研究成果，概述学者们关于马来西亚政治发展规律、政治制度特点以及政治演进趋势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既有研究的不足，思考可深入推进的研究方向及路径。

一、关于战后马来西亚政治问题的整体性研究

马来西亚是二战后建立的新兴民族国家，由西马的十一个州、东马的两个州和吉隆坡、布城、纳闽三个联邦直辖区组成，其主体位于马来半岛南部。1957年8月，马来亚联合邦实现在英联邦内的独立，1963年9月，与新加坡、沙巴、沙捞越组建了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为了文字表述的方便，本文在提及该国1963年9月以前的历史时将马来亚联合邦简称为“马来亚”，提及1963年9月以后的历史时，将其简称为“马来西亚”，涉及该国整体情况则统称为“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是多民族国家，马、华、印三大族群并立，在东马和西马的山林地区还生活着大量原始土著人。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在社会生活、文化习俗、经济发展各领域均存在较大差异，加之建国初期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人口比例势均力敌，在这个多元社会中，族群关系尤其是马、华两族的关系成为影响马来西亚政治社会稳定及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因此，从族群问题入手考察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族群关系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认识和评价马来西亚政治的逻辑出发点。国内几乎所有研究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问题的著作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族群问题。其中，韦红的《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是较早系统研究马来西亚族群问题的著作。该书聚焦东南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着重探讨二战结束后至90年代末，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五个东南亚国家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作者关注经济开发给各国民族关系及社会发展带来

的影响，重点分析不同时期马来西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持族群关系稳定的战略举措及政治实践。^①廖小健的《战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华人与马来人关系研究》是一部论述战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演变的重要著作。该书系统介绍了马、华两族关系的发展变化、问题与症结，着重探讨马来西亚在族群矛盾交织的情况下，整合族群矛盾与平衡族群利益，避免族群间暴力冲突，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等问题，并且认为，“马来西亚主要族群得以长期和平共处的原因在于马华两族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族群利益达到一定的平衡”。^②这一观点代表了国内学者对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普遍认识。

了解一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情况，最便利的手段是阅读该国的国别史、断代史或是一些综合类的学术著作。有关马来西亚历史的早期著作大多由西方国家的学者或是东南亚地区学者撰写，如林芳声的《马来亚》^③、许云樵的《马来亚史》^④等，但囿于时代的局限性，这些著作仅仅简单介绍了马来亚的社会经济基本情况，对殖民地时期政治制度及社会政治变动情况着墨不多，研究视角较为单一，未能深入分析推动马来亚政治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国内学术界在20世纪70、80年代翻译了一批西方学术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理查德·温斯泰德著，姚梓良翻译的《马来亚史》。^⑤该书系统介绍了马来亚从史前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结构紧凑、资料丰富，对于了解马来亚的历史沿革及古代政治文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受阶级立场、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该书对马来亚历史进程的描述以及政治发展的评价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因此需要批判性地阅读，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马两国正式建交，经贸、人文、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国内学者撰写了一批介绍马来西亚基本情况的著作。朱振明主编的《当代马来西亚》全面介绍了马来西亚的基本国情，重点关注独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领域的发展情况，其中的政治部分关于马来西亚宪法、国家机构及主要政党的情况介绍是了解马来西亚政府运作模式及政治体制特点的入门指南。^⑥范若兰、李婉珺、廖朝骥合著的《马来西亚史纲》梳理了马来西亚的历史演进脉络，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特点与趋势，认为“族群政治是马来西亚当代史的核

① 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72～146页。

② 廖小健：《战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华人与马来人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③ 参见林芳声：《马来亚》，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

④ 参见许云樵：《马来亚史》，新加坡青年书局1961年版。

⑤ 参见理查德·温斯泰德著，姚梓良译：《马来亚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⑥ 朱振明：《当代马来西亚》，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138页。

心，是解析马来西亚的钥匙，伊斯兰教政治化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趋势，两者已成为影响马来西亚发展走向的核心因素”。^①廖小健撰写的《世纪之交的马来西亚》着重研究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政治、经济、外交及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分析了20世纪末一系列热点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及对马来西亚政局走向的影响。“与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相比，马来西亚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始终没有发生类似印尼和菲律宾那种足以推翻政府的声势浩大的‘人民运动’，主要原因在于马来西亚实行了数十年的民主选举，推翻政府可以通过合法的选举来实现，完全没必要诉诸非正常的‘人民运动’。”^②

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也在逐步丰富对马来西亚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华人史、妇女史等不同领域专题史的研究。石沧金的《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是当前国内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系统性论著，作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收集整理马来西亚华团的重要资料，并据此论述华团的进步性与保守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③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者对马来西亚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已经非常成熟，形成了老、中、青接力的研究格局，一方面固然有助于形成集聚效应，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为促进中马两国友好往来发挥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资源的过度集中，产生大量的重复研究，不利于研究范围的拓展与研究领域的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探索。作为东南亚地区极具代表性的现代民族国家，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及现代化进程备受关注。钱乘旦主编，陈晓律等人合著的《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是基于现代化发展理论，专门针对马来西亚的个案分析。该书宏观考察了当代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多视角解读了马来西亚集民主与权威于一体的特殊政治体制的形成原因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特点，认为英国殖民政府时期建立的文官系统对马来西亚独立后的政治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种族问题直接导致了马来西亚民主与权威交替的政治格局的出现。^④丘立本撰写的《马来西亚现代化与民族问题》一文将研究的触角对准马来西亚民族问题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着重分析了拉赫曼、拉扎克和马哈蒂尔三位总理华人政策的特点及其影响，总结了马来西亚现代化实践的重要经验，强调要正确发挥国家

① 范若兰、李婉珺、廖朝骥：《马来西亚史纲》，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287页。

② 廖小健：《世纪之交的马来西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319页。

③ 参见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④ 钱乘旦主编，陈晓律等：《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8～201页。

在现代化进程中调节民族关系的作用。“马来西亚的经验说明，对多元民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政权能否调节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代表和维护各民族共同的长远利益是这些国家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①韩方明的《华人与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探讨华人在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创新性地提出了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分期方法以及华人三重性的概念，并运用均衡结构理论分析马来西亚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结构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与特点。^②

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160条规定：马来人是指“信仰伊斯兰教，使用马来语，依循马来习俗的人”。^③基于这一制度规定，贺圣达在《东南亚伊斯兰教与当代政治》一书中指出，“宗教与民族的亲缘关系使马来族群经常受到族与教两方面的影响，而以政治思想认同更为明显”，^④这一特征增加了马来西亚政治问题的复杂性和尖锐性。肖建明认为对马来西亚政治产生直接影响的是国内最大的反对党——“马来西亚伊斯兰党”，它在马来西亚政治中的突出表现让世人刮目相看，成为马来西亚社会的热点话题之一。^⑤马来西亚伊斯兰党的政策主张及参政行为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戴小峰分析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对马来西亚政治发展道路可能造成的影响，他认为，“在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方兴未艾的情况下，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仍具有勃勃生机，对马来西亚社会和政治影响力仍会不断增强，马来西亚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伊斯兰模式’。”^⑥在考察了伊斯兰教对当代马来西亚政治生态的影响之后，王文俊认为：“宗教议题始终是马来西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也是行之有效的政治动员工具。”^⑦贺圣达也指出：“马来西亚有待回答的基本问题是，在伊斯兰认同继续发展的同时，能否保持使马来西亚得以繁荣的族群社会的微妙平衡。”^⑧

总之，战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及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族群关系的演变、政教关系的博弈以及社会生活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国内学术界对马来西亚政治问

① 丘立本：《马来西亚现代化与民族问题》，罗荣渠、董正华编：《东南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页。

② 韩方明：《华人与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2~354页。

③ 《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编译：《世界各国宪法》（亚洲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363页。

④ 贺圣达主编：《东南亚伊斯兰教与当代政治》，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

⑤ 肖建明：《当代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与政治》，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⑥ 戴小峰：《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初探》，《东南亚纵横》，2002年第12期，第45页。

⑦ 王文俊：《论伊斯兰教在马来西亚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11期，第48页。

⑧ 贺圣达：《伊斯兰教与影响当代东南亚政治发展的三大问题》，《学术探索》，2004年第10期，第80页。

题的研究正是围绕这些焦点问题而展开的。

二、对战后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研究

研究战后马来西亚政治发展情况，首先需要对政治发展这一概念做出清晰的定义。政治发展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西方的区域研究和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研究范式，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影响较大的是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关于政治发展的定义。他认为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包括政治一体化、制度化、民主化三个方面。^①亨廷顿所指的政治发展强调增强政治运作的规范程度，增加政治的民主因素。国内学者也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政治发展有其内在的结构和逻辑，“政治一体化、政治结构化、政治功能化和政治民主化只是经济发展对政治发展提出的要求”，从总体上说，“政治发展意味着建立一个适应历史、社会、文化要求变化的稳定的政治体系”。^②这一理论对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启发作用，同样适用于考察战后马来西亚政治发展情况。

马来西亚是二战后在殖民地基础上建立的新兴民族国家，其政治发展源于马来社会的传统政治文化及西方国家的殖民政治遗产。范若兰等学者在梳理马六甲王国百年兴衰历程后指出，“马六甲王国对马来西亚的历史影响深远，它不仅使马来语、伊斯兰教成为马来文化最核心的构成要素，而且促成了马来王权观念、君臣观念的形成，君臣观念成为马来文化的核心”^③。从这个角度说，马六甲王国的政治文化形塑了马来人社会，“王权观念和伊斯兰教迄今仍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和意识形态”。^④王成研究了英国殖民政府对马来亚的治理模式，认为“在建立殖民统治过程中，英国没有完全拆解马来亚社会的传统政治结构，而是对其加以改造，通过马来人原有的政治结构推行英国的殖民政策。英国官员掌握了统治权力，但对广大农民而言，苏丹的地位与权威并没有受到损害”。^⑤庞卫东更进一步指出：“在新制度引入的同时，英国并没有推翻马来

^① 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6～27页。

^②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

^③ 范若兰、李婉珺、廖朝骥：《马来西亚史纲》，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52～53页。

^④ 同上，第283页。

^⑤ 王成：《从西方化到本土化：英国的殖民统治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第86～87页。

亚传统的苏丹统治结构，这也是马来西亚立宪君主制政体的历史渊源。”^①黄云静归纳总结了英国殖民统治给马来亚政治结构带来的变化，认为“二战前，现代政治模式在马来亚已基本成型，宪法、立法机构、联邦体制均已出现并在发展之中。可以说二战前英国的统治模式为二战后乃至独立后的马来亚的政治制度建立了基本框架”。^②如果说英国殖民政府对马来亚传统政治结构的改造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那么，他们在马来亚经济、社会以及行政管理等领域采取的“分而治之”“马来人优先”等政策则造成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二战后，英国殖民政府抛出的“马来亚联邦”计划极大地刺激了马来人的民族主义意识，代表马来族群利益的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应运而生，成为马来西亚政坛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这一时期，华人、印度人族群政党纷纷成立，并围绕各自族群利益展开政治博弈，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生态基本形成。为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共同目标，马、华、印三大族群政党通过政治协商组建联盟党，达成暂时的利益妥协。国内学者高度关注马来亚独立初期形成的族群政治模式。李江运用政党合作理论分析马华印联盟党成立的背景及其政治意义，他指出：“在殖民地国家的殖民统治者的实力仍然很强大的背景下，该国的政治团体必须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而在马来人与华人族群隔阂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族群政党联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族群之间的团结，实现各族群的共同利益。”^③孙振玉则进一步提出：“马来亚的族群政治是一种实用性质的政治安排，它在尽量化解各主要族群间的矛盾对立和斗争的情况下，通过族群政党间的合作与协商，来保证各自的利益，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④在马华印联盟党的带领下，马来亚于1957年实现在英联邦内的独立，联盟党成为国家执政党，政治地位不可撼动。那么，这一时期政府的运作方式是怎样的？在联盟党内部，各族群政党的政治地位又如何？曹云华等人从联盟党早期政治实践的角度予以考察：“鉴于各方互有所需，且力量对比相对平衡，联盟内部曾一度出现过短暂的协商民主政治氛围。”^⑤陈衍德等人从各政党的选民构成角度进行分析：“巫统因大多数选民为马来人而位居优势，马华公会和印度人

① 庞卫东：《反思与重释：英国殖民统治对马来西亚的影响》，《史学月刊》，2013年第9期，第132页。

② 黄云静：《马来西亚现代政治制度的确立——兼论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问题》，《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1期，第31页。

③ 李江：《族群政党合作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3～49页。

④ 孙振玉：《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与华人及其关系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⑤ 曹云华、许梅、邓仕超：《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参与》，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国大党则处于依附地位。”^①张锡镇进一步总结为：“巫统、马华公会、印度人国大党虽然同为执政党联合体的成员，但它们享有的权力地位实际是不平等的。巫统通过某种交易和默契，享有更多的特权。”^②事实上，巫统在执政联盟内的优势地位折射出的正是马来人在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所享有的政治特权地位。

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制订并颁布独立后的首部宪法，确立国家政治体制为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民主制，伊斯兰教为国教，并对马来人的特殊地位予以确认。^③单从法律条文上看，两院制的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最高元首是礼仪上的行政首脑，内阁由最高元首任命，负责国家机器的运转。^④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掌握实权的正是以总理为首的内阁。在观察了马来西亚建国后的多场议会活动后，廖少廉指出：“根本不存在什么‘议会至上’，而只有行政专横，不是内阁执行议会的决议，而是议会为政府的活动制造法律依据。”^⑤自独立以来六十多年的时间里，马来西亚历届内阁总理均为巫统主席，^⑥巫统的政治优势地位借由总理的特殊权利得到保障，这样的权力结构模式也为政治强人的产生以及威权主义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20世纪50、60年代，在议会民主制的政治框架下，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活异常活跃，除了执政的马华印联盟党外，还成立了马来亚独立党、泛马来亚伊斯兰党、民主行动党、民政运动党等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政党，各个政党围绕各自利益诉求及政治主张展开激烈竞争。韦红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东古·拉赫曼奉行的温和的种族平衡政策与马来亚所实行的英国式民主制度发生了冲突，英国式民主制度给予各种族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参与政治的权力，而种族平衡政策则旨在保持马来人的政治特权”。^⑦尽管反对党的政治活动无法撼动马华印联盟党的执政地位，但政府依然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了对反对党的压制。1969年，围绕联邦议会选举，马来西亚的政治紧张态势发展到顶点，最终酿成“5·13”族群暴力冲突事件。关于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国内外学者有各种各样的解读，马来西亚官方认为族群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导致事件爆发的主要

① 陈衍德、任娜：《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族际关系演变新探》，《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0页。

② 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6页。

③ 吴明安著，张卫译：《马来西亚司法制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7～70页。

④ 同上，第71～72页。

⑤ 廖少廉：《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上），《南洋问题研究》，1983年第2期，第91页。

⑥ 这一局面自2018年希望联盟（简称“希盟”）上台执政后得到改变。

⑦ 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原因，^①这一观点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5·13”事件爆发后，马来西亚进入紧急状态，国会修改宪法，禁止对宪法规定的国语、马来人特殊地位、马来统治者的地位和主权等条款进行质询。^②为了扩大执政党的统治基础，巫统拉拢了更多政党加入联盟，由十多个不同族群政党组成的国阵取代了早期的马华印三党联盟。廖小健在《战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研究》中指出：“马来人从保持政治优势过渡到拥有绝对的政治主导权。”^③李路曲认为，“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镇压反对党、修改宪法，限制政治参与，尤其是华人政治参与的举措，导致政党政治中巫统一统天下，垄断国家权力，马来西亚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④韦红对这一时期马来西亚政党制度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巫统’在国阵中的主宰地位反映出马来西亚政党制度的威权主义色彩。”^⑤

为了消弭种族裂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国阵政府在70年代初期推出了旨在消除贫困、重构社会的“新经济政策”，国家经济结构得到有效调整。马哈蒂尔执政时期是马来西亚各领域发展最快的时期，其政治治理模式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陈鸿瑜指出，马哈蒂尔通过削弱国家元首的权力、结束巫统内部党争、瓦解反对党联盟、修改内安法、限制媒体及言论学术自由等手段巩固威权体制。^⑥黄云静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分析了马哈蒂尔在80、90年代频繁修宪的动机，认为其目的是为了打击以苏丹为首的旧贵族势力，强化马哈蒂尔为首的新贵和中产阶级的权益，建立威权政府。^⑦范若兰等学者援引马来西亚学者祝家华关于“族群威权民主”的概念，认为“这一时期的马来西亚具有民主的外衣，内里却是族群威权，核心是威权统治，主要表现是政治权力的中心与边缘，支配与被支配特征”。^⑧尽管研究视角各有侧重，但国内学者普遍将马哈蒂尔执政时期的政治体制定义为威权政治。贺圣达认为这一时期马来西亚实际上形成了“马哈蒂尔-国民阵线-政府三位一体的统治体制”。^⑨曹云华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分析了威权政治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的积极意义，认为“巫统领导的国民阵线，在组织

① 廖小健：《战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43页。

② 陈鸿瑜：《马来西亚史》，兰台出版社2012年版，第371～372页。

③ 廖小健：《战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85页。

④ 李路曲：《当代东亚政党政治的发展》，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⑤ 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⑥ 陈鸿瑜：《马来西亚史》，兰台出版社2012年版，第425～456页。

⑦ 黄云静：《马哈蒂尔时期的修宪与马来西亚宪政发展》，李文主编：《东亚：宪政与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⑧ 范若兰、李婉珺、廖朝骥：《马来西亚史纲》，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213页。

⑨ 贺圣达：《泛舟南洋——贺圣达东南亚研究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

和动员群众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而保证政治参与不会出现混乱和失控的状态”。^①陈晓律等人持同样的观点，因为“在一个种族分裂的社会中，因发展所造成的紧张往往比一般的社会更为严重，也就更需要一个威权主义的政府来加以控制”。^②

20世纪末期是马来西亚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以伊斯兰党为首的反对派对马来西亚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马来族群政党内部也开始出现分裂，直接导致了马来人选票的分散。为了达成政治目标，四六精神党、伊斯兰党等反对党开始与非马来人政党——民主行动党加强合作，组建政党联盟。李江从促进公平发展的角度考察了马来西亚反对党联盟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他认为：“反对党之间的合作使它们在1990年的大选中获得的议会议席数明显增加，也使该国的议会选举首次出现了较多的反对党集体对抗国阵的现象，有利于增强该国议会选举的竞争程度。”^③爆发于20世纪末的国际金融危机、马来西亚政改运动以及9·11恐怖袭击等事件极大地影响了马来西亚政治演进轨迹。李路曲注意到马来西亚一党为主的政治体制内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认为反对党利用这个时机大大发展了自己的组织，替代阵线成为最大的反对党联盟，成为执政的国民阵线的有力挑战者。^④廖小健将1999年大选看作马来西亚民主政治的重要里程碑，它“使执政联盟数十年以来首次面对一个代表三大民族反对党联盟的挑战”，马来西亚的“两线制”雏形显现。^⑤

进入21世纪后，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进程明显加快，无论是反对党力量的不断壮大，还是市民参政意识的广泛觉醒，均有力地推动了马来西亚的社会转型与政治变革。在国家教育计划和经济政策扶持下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日益壮大，他们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增多，对威权政治、族群政党政治的离心倾向加强，成为推动民主转型的中坚力量。这一观点已被国内大多数学者所接受。^⑥一些学者从

① 曹云华：《东南亚的民主实验——评马、菲、印尼、新四国的权力更替》，李文主编：《东亚：宪政与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② 钱乘旦主编，陈晓律等：《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1页。

③ 李江：《族群政党合作与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7页。

④ 李路曲：《当代东亚政党政治的发展》，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⑤ 廖小健：《世纪之交的马来西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248页。

⑥ 该观点散见于国内学者的研究著述中，如李文主编：《东南亚：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203页；王虎：《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范若兰、李婉珺、廖朝骥：《马来西亚史纲》，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227页。

新世纪举行的几场重要的议会选举中寻找马来西亚政治转型的轨迹。李辛、凌海将2008年大选看作马来西亚威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分水岭，认为“国阵受到了反对党强有力的制约，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修改宪法和制定重要政策了，马来西亚国会两大政党联盟分庭抗礼，已经接近两党体制”。^①庄礼伟根据2008年大选后马来西亚政治生态的若干重要变化，对竞争环境下马来西亚政治行为体的行为规律进行总结，指出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正处在“从威权政治向多元竞争型政治的快速转变过程中，政治上的发展策略主要是绩效竞争、政治结盟和话语动员”。^②针对2013年大选结果，庄礼伟还从选民结构变迁的视角考察马来西亚竞争型威权体制的走向，认为“当今马来西亚选民结构中的主要潮流正在推动竞争型威权体制的消解”，^③强调选举型威权体制可以通过选举来瓦解。^④辉明、范若兰等学者则认为2013年大选激发了新一代华人的民主理念，加强了马来西亚的“两线制”政治，“去种族化”和“去宗教化”已经成为时代潮流，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加速推进。^⑤

2018年大选成为检验独立以来马来西亚民主政治成效的重要指标。刘勇从国阵与希盟竞选策略的角度分析造成国政失利，希盟上位的原因。^⑥骆永昆强调政治领袖的影响力，认为正是由于马哈蒂尔与纳吉布的权力斗争，以及安瓦尔推动的政改运动动摇了巫统的执政根基，最终造成了马来西亚政局变天。^⑦尽管分析的角度各有差异，但学者们普遍认同2018年大选使马来西亚从选举型威权向民主迈出了一大步，反映了马来西亚选民主意识的提升。然而，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变局后，马来西亚政治生态领域的不稳定性凸显，具体表现为马来族群政党分裂加剧、执政联盟快速更替、内阁频繁重组。许利平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困境的动因进行了剖析，认为“‘多党并立’的政治格局蕴含诸多不稳定性，族群政治固化是马来西亚陷入政治困境的根本原因，‘青蛙政治’

① 李辛、凌海：《马来西亚民主化和政治转型的进程与特色》，《比较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91～92页。

② 庄礼伟：《多元竞争环境下的马来西亚政治生态》，《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2期，第12页。

③ 庄礼伟：《马来西亚竞争型威权政治体制的走向：以选民结构为视角》，《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2期，第14～21页。

④ 庄礼伟：《第13届国会选举前夕的马来西亚：选举型威权的终结？》，《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2期，第22页。

⑤ 参见辉明：《马来西亚政治海啸：第13届国会选举分析》，《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第19～27页；范若兰：《马来西亚2013年大选与政治发展前景分析》，《当代世界》，2013年第10期，第56～59页。

⑥ 参见刘勇：《大选后马来西亚政治新变化》，《国际研究参考》，2019年第1期，第42～47页。

⑦ 骆永昆：《马来西亚政治变局探析》，《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5期，第82～96页。

动摇了马来西亚政权稳定的根基”。^①陈戎轩、傅聪聪借鉴社会分裂结构理论框架，指出当前马来族群政党的格局是政治社会精英内部矛盾和公民社会分裂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②

回顾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政治实践，民主政治探索之路走得并不平坦，至今依然挑战重重。陈晓律等将其总结为介于民主与权威之间的特殊模式，认为“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始终在自由权威主义与有限民主之间摇摆，现行的政治体制中的民主，不是基于民族的整合，而是基于社会各种族社团的分裂”。^③对于马来西亚民主政治的发展前景，陈晓律、陆艳持审慎的态度，认为“中产阶级力量的增强将使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发生民主化的变革，但马来人特权无疑是马来西亚通向民主制的最后障碍，因为民主原则不允许社会的某一部分人以任何借口享受任何特权”。^④许利平根据东南亚国家政治转型的经验预测马来西亚政治转型的前景，认为如果以2018年第四波“政治海啸”为起点，可能需要5~10年才能达到政治稳定，“未来的族群政治和‘青蛙政治’将在强化与弱化之间不断变化，马来西亚政治也将在动荡和稳定之间循环反复，最终实现动态平衡”。^⑤

三、对影响马来西亚政治发展两大因素的研究

（一）对族群关系的研究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群国家，族群关系是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张锡镇在对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历程进行持续考察后得出结论：“种族关系始终是马来西亚政治斗争的焦点和政治稳定的关键”。^⑥曹庆峰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马来西亚族群矛盾产生的原因，认为“英国殖民政府推行‘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及‘马来人优先’原则在马来各民族之间所造成的政治区隔、经济差异、文化鸿沟和心理隔膜深刻影响其独立后民族政策的制定，甚至至今仍成为制约民

^① 许利平：《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困境的动因及其前景》，《当代世界》，2021年第5期，第65~70页。

^② 陈戎轩、傅聪聪：《马来西亚社会转型与马来族群政党分裂——基于社会分裂结构理论视角》，《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3期，第1页。

^③ 钱乘旦主编，陈晓律等：《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365页。

^④ 陈晓律、陆艳：《在民主与权威之间——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特点剖析》，《世界历史》，2000年第4期，第11页。

^⑤ 许利平：《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困境的动因及其前景》，《当代世界》，2021年第5期，第71页。

^⑥ 张锡镇：《当代东南亚政治》，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族关系和谐发展的沉重历史包袱”。^①

独立后尤其是马来西亚联邦建立后，族群关系的变化与各族群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动、马来西亚政府的族群政策以及各族群政党的竞争与博弈关系密不可分。族群关系的变化最终影响到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1957年、1969年和1990年是族群关系转变，并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个关键时期。

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马来亚各族人民围绕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展开了激烈争论，在英国的操纵下，1957年通过的《马来亚联合邦宪法》确立了“马来亚是马来人的马来亚”的原则。基于该宪法对马来人特权的维护，林远辉、张应龙指出：“战后初期华侨社会所处的不平等政治地位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被以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不仅不利于建设团结进步的新国家，而且在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在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中种下了不稳定的根源。”^②建国初期，为了改造单一的经济结构，政府采取了鼓励私人资本、加大出口力度等措施，华人经济力量进一步增强，马、华经济差距继续扩大。陈衍德、任娜从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结构的视角分析这一时期马来人与非马来人族际关系的基本状况，认为“马来人占据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华人则享有经济上的优势，双方均有所得和有所失，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③陈晓律等人强调现代化对社会结构造成的影响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因为现代化的一个最明显的后果就是一些集团比另一些集团的发展速度要快，这就使处于落后的集团对发展较快的集团充满了不满和怨恨，如果这种集团刚好与种族的界限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种冲突就会更加激烈了”。^④

以种族为基础的多党政治一直深刻影响着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演进，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以种族性政党为基础的多元化竞争。庄礼伟分析了多元竞争环境下的马来西亚政治生态，认为“围绕着族群、宗教立场和身份来进行的族群政治动员已成为马来西亚政党竞争的惯用手段，通过激活族群边界来动员群众也是常见的政治竞争模式”。^⑤1969年大选正是这一竞争模式的集中体现，最终导

① 曹庆峰：《马来西亚民族政策的嬗变及其启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69页。

② 朱杰勤主编，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509页。

③ 陈衍德、任娜：《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族际关系演变新探》，《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0页。

④ 钱乘旦主编，陈晓律等：《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2页。

⑤ 庄礼伟：《多元竞争环境下的马来西亚政治生态》，《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2期，第16页。

致马、华族群矛盾彻底激化，酿成“5·13”暴力冲突事件。廖小健在综合了国外尤其是马来西亚本国学者的各种研究的合理性后做出比较全面的分析总结：

“‘5·13’事件的爆发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族群差异形成的隔阂、经济差距导致的矛盾，应是引发族群冲突的深层和最根本的原因。独立后马华两族关系的持续紧张，1969年马来西亚政治生态的变化，各种族群课题和社会事件冲击，以及意想不到的大选成绩，也与这一事件有着直接的联系。”^①

因议会选举而引发的族群暴力冲突事件直接导致70年代政府族群政策的转变。通过修改宪法、修改选举法、组建“国民阵线”，制定“新经济政策”等手段，巫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马来人的特殊地位被提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其中，“新经济政策”作为一项调整族群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大战略举措广受学界关注。由于研究角度和评价标准的差别，国内学者对这一政策的评价存在较大差异。丘立本、曹云华等人从民族关系调和及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角度对该政策持比较肯定的看法，认为“新经济政策”在消除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的社会经济根源方面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它实现了民族和谐，促进了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是马来西亚根据自身国情探索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②汪慕恒、林勇着重考察“新经济政策”中关于马华族群的不平等条款及其造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认为“新经济政策”对族群关系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是马来人资产阶级与华人资产阶级争夺民族市场的一种种族主义政策，促进了马来西亚整个社会的阶级分化和马来人内部的分化。^③

与马来族群经济地位的上升和政治支配地位的巩固相对照的是华人、印度人等族群政治地位的日益边缘化。许多学者从族群政党政治的视角分析“5·13”事件后马来西亚政治力量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张应龙认为，“国民阵线的组成改变了华人政治力量的格局，尽管有更多的华人政党加入执政阵营，但并没有提高华人的政治影响力，反而使华人社会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削弱”。^④廖小健在对比分析马来西亚马、华两族执政党的不同地位、政府公共职位的族群分配比

① 廖小健：《战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44页。

② 丘立本：《马来西亚现代化与民族问题》，罗荣渠、董正华编：《东南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211页；曹云华：《试论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从华人与原住民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东南亚纵横》，1998年第2期，第17~21页。

③ 汪慕恒：《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与华人经济》，郭梁主编：《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9~47页；林勇：《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经济地位变化比较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页。

④ 张应龙：《马来西亚国民阵线的组成与华人政党的分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15~22页。

例以及选区划分的族群利益倾向后指出：“马来西亚存在非常明显的族群政治分层或政治上的族群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大大削弱了华人在族群权益博弈中的地位。”^①

20世纪90年代，由于马来族群内部竞争加剧，巫统逐渐失去马来人的绝对支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政府以“新发展政策”取代“新经济政策”，推行“全民性”的发展主义路线。马哈蒂尔总理极力宣传“种族间的和谐是马来西亚取得卓越成功的关键因素”，是“马来西亚成功的秘诀”，并呼吁马来西亚人民“远离冲突与纷争，彼此之间不要有政治纷争，或者种族仇视”。^②韦红考察了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变化趋势，认为“进入90年代后，马来西亚国民的政治价值取向逐渐走向理性化和中庸化，虽然不时有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玩弄种族火焰’，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极易挑起人们的种族主义情绪，从而导致民族间的极端对立与冲突”。^③

进入21世纪后，快速的经济增长、加速推进的城市化和急剧的社会变革造成阶级、阶层分化加快，阶级矛盾逐步取代族群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然而，族群色彩的淡化并不意味着族群政治彻底从马来西亚政坛消失，一些政客依然会利用族群话语进行政治动员，族群问题始终是挑动马来西亚政治神经的重要因素。廖小健认为这个时候的马华族群关系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族群关系相对和谐，社会发展相对稳定。之所以会形成这一局面，主要原因在于马华两大族群基本的生存发展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④陈衍德、任娜将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特点归纳为：“政治上既合作又竞争，经济上既互补又此消彼长，文化上既对立又相互渗透。”^⑤政府与华人群体的共同作用使马华族际关系维持“不平等的和谐”局面。^⑥

在马来西亚的族群构成中，印度人群体以及大量生活在偏远落后地区的原始土著人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近些年，国内学者开始关注马来西亚印度人社会，罗圣荣在《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及其历史变迁》一书中对今天定居在马来西亚

① 廖小健：《华人政治地位与马来西亚的政治分层》，《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5期，第46~51页。

② 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③ 同上，第139页。

④ 廖小健：《战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华人与马来人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⑤ 陈衍德、任娜：《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族际关系演变新探》，《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2年1月，第9页。

⑥ 同上，第15页。

的印度人的由来及其在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马来西亚独立，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完成了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型及政治认同的转变，蜕变成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度人”。^①石沧金、常樟平将研究重点锁定在印度人国大党的成立及其早期政治活动上，认为印度人群体的相对弱小及其社会内部的严重分化削弱了马来西亚印度人国大党在马国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②梁英明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马来西亚印度人在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作为三大种族集团之一的作用已经无足轻重。”^③阮金之认为自马来西亚独立以来印度人就陷入了族群困境，随着经济社会的演进与发展，他们在马来西亚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已经全面边缘化，只有取消族群歧视的各种制度与政策才有可能改善这一现状，真正扭转印度人的处境需要政府制定全面详细的政策规划并予以大力扶持。^④石沧金运用政治参与理论，从原因、途径、主体、影响等方面比较马来西亚华人与印度人两大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参与的异同，将两个民族政治参与的差别和效果概括为：“印度人是‘多元异体’，华人是‘多元一体’^⑤。”

目前国内有关马来西亚原住民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孔建勋等学者撰写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与族群态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实证研究》简要介绍了原住民奥朗阿斯里人的族源以及独立后马来西亚政府针对阿斯里族群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及其影响。作者认为：“联邦政府设法使阿斯里人融入马来主体社会的目的是要增加马来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而增加本族群的选票。”^⑥正是在这一目标的驱使下，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制定了一系列针对阿斯里人的强制同化政策，但最终事与愿违，不仅没能成功使阿斯里人整合到马来人社会，反而强化了他们作为马来西亚最正宗的土著阿斯里人

① 罗圣荣：《马来西亚的印度人及其历史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② 石沧金、常樟平：《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的成立及其早期政治活动（1946~1957）》，《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1期，第109~123页。

③ 梁英明：《马来西亚种族政治下的华人与印度人社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4页。

④ 阮金之：《民主转型环境下的马来西亚印度人族裔抗争运动》，《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第62~67页。

⑤ 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和印度人政治参与历史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70页。

⑥ 孔建勋等：《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与族群态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1页。

的族群认同。^①

（二）对政教关系的研究

贺圣达从马来西亚联邦宪法条文中寻找伊斯兰教影响政治的途径，即除了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外，宪法还规定在联邦各州设立伊斯兰教法庭，凡有关穆斯林之间的纠纷，均由穆斯林法庭依宗教法裁决，在世俗法律的条文中也引进了一些伊斯兰教法条文。“虽然世俗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但伊斯兰教对政治仍有一定影响力。”^②陈中和以伊斯兰法律地位的变迁为视角考察当代马来西亚政教关系，认为“宪法中伊斯兰教作为国家宗教的条文是一种彰显马来人主权的配套设计，而非基于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③他着重强调了马哈蒂尔执政以来推行伊斯兰化改革对伊斯兰教法律地位的影响，“马来西亚司法机构正在逐步扩大解释伊斯兰教作为马来西亚联邦宗教的含义，伊斯兰教的地位在多次法律判决中不断得到提升，使其逐渐脱离最初的设计，最终动摇马来西亚的世俗化体制”。^④

国内研究马来西亚政教关系的一些学者，如范若兰、许利平、肖建明等人也注意到马来西亚伊斯兰教政治化的发展趋势，他们主要从政党竞争的角度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及由此衍生出的各类问题。肖建明考察了马来西亚建国以来伊斯兰政治的发展历程，认为“‘政治伊斯兰化’和‘伊斯兰政治化’成为马来西亚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突出表现在马来西亚两大政治派别——执政党巫统与反对党‘马来西亚伊斯兰党’之间的‘伊斯兰竞赛’上”。^⑤范若兰同样指出：“马来西亚政教关系集中体现在两个政党——巫统和伊斯兰党身上，两个政党为争夺马来选民的支持，竞相向伊斯兰教寻求合法性，由此引发了马来西亚政坛上民主与专制、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的激烈争论和斗争。”^⑥许利平重点研究了马哈蒂尔政府的伊斯兰教政策，认为马哈蒂尔利用执政党的优势地位，将马来人信仰的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贯穿在其领导的执政党巫统的行动纲领中，并利用国家机器大力推动和发展当代伊斯兰意识形态，使其为政府所实施的

① 孔建勋等：《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政策与族群态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101页。

② 贺圣达主编：《东南亚伊斯兰教与当代政治》，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7~278页。

③ 陈中和：《当代马来西亚政教关系研究——以伊斯兰法律地位的变迁为视角》，《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第50页。

④ 同上，第52页。

⑤ 肖建明：《当代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与政治》，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⑥ 范若兰：《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页。

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提供合法的依据。^①马来西亚主要政党围绕伊斯兰教展开的激烈竞争推动伊斯兰教从国家政治边缘走向政治中心，形成一场席卷全国的伊斯兰复兴浪潮，这也成为关注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学者们重点研究的课题。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深刻改变了马来西亚政治格局的走向。对于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的原因，国内专家学者众说纷纭。杜红侧重从历史方面尤其是建国以来族群关系的紧张状态寻找原因，认为“种族骚乱是马来西亚出现伊斯兰潮的导火索，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复兴是一场宗教——民族的复兴”。^②黄佳程则倾向于从政府政策的层面予以解读：“面对这种（来自伊斯兰党竞争的）政治压力，巫统决定在保持多元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伊斯兰教靠拢，宣布了多项进一步倾向伊斯兰教的政策，使得伊斯兰复兴运动上升至国家层面。”^③范若兰同样强调政府政策的推动力，认为“政府的亲伊斯兰教政策一方面是对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回应，另一方面则唤醒了马来人的伊斯兰意识，反过来更促进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④

从表现形式上看，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既有官方的介入和参与，也有政党政治集团以及民间伊斯兰组织的积极推动，其引发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巨大变化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曹庆锋认为：“马来人复兴伊斯兰教的目的在于培养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荣誉感，它既是一场复兴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的文化运动，又是一场实现民族国家全面复兴的社会政治运动。”^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伊斯兰党大幅度调整党的纲领，提出建立伊斯兰国家的主张，引发了政党政治领域激烈的竞争。齐顺利比较了巫统和伊斯兰党的建国理念，认为“伊斯兰国”的争论暴露出巫统和伊斯兰党完全不同的建国方向，“一个正在建构以马来人为中心的世俗民族国家，另一个旨在建立的是神权‘伊斯兰国’”。^⑥许利平分析了朝野两大政党提出“伊斯兰国”的动机，认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关于马来西亚的前途和未来的设计与规划。基于马来西亚特殊的族群、宗教背景，他进一步强调：“‘伊斯兰教国’的概念必须符合三大种族的利益，否则宗教矛盾就有可能演变成种族矛盾，最后可能变成社会矛盾，造成国家

① 许利平等：《当代东南亚伊斯兰发展与挑战》，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② 杜红：《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潮及政府对策》，《东南亚研究》，1997年第6期，第7页。

③ 黄佳程：《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层面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东南亚南亚研究》，2012年第2期，第81页。

④ 范若兰：《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试析》，《东南亚研究》，1998年第1期，第10~13页。

⑤ 曹庆锋：《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126页。

⑥ 齐顺利：《马来西亚伊斯兰国与民族国家——争论、影响与趋势》，《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6期，第4~10页。

的不稳定。”^①范若兰、孟庆顺在全面考察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国的理念与实践后指出：“伊斯兰教已成为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和种族政治斗争的工具，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无论马来人政党还是华人政党都被卷入其中，各政党借着伊斯兰教国议题掀起新一轮的互相攻击，加剧了伊斯兰教政治化的倾向。”^②

随着马来西亚民主政治转型及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关于伊斯兰教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成为国内学术界争论的热门话题。许利平从伊斯兰党政治实践的角度予以考察，认为“伊斯兰党在吉兰丹和丁加奴州取得执政地位，反映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民主化程度，为一部分穆斯林表达民意找到了出路，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治民主化的建设步伐”。^③范若兰结合马来西亚伊斯兰党的政治理念展开分析，认为“伊斯兰党用协商、公正等伊斯兰原则进行民主、平等、人权、自由、廉洁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④但她同时也提醒：“伊斯兰党的真主主权、政教合一的主张使人们对它能否真正建立民主政治抱怀疑态度。”^⑤叶笑云分析了伊斯兰教对马来西亚民众政治心理的影响，认为“伊斯兰教义要求个人必须与社会相互依存、彼此和谐、必须对社会的幸福与繁荣负责；必须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以维护团结和合作；必须学会自我克制和宽容”^⑥，这种政治心理一方面有利于马来西亚国家整合，另一方面也影响着政治参与主体的行为选择。

四、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马来西亚的研究进入繁盛期，围绕马来西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领域的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近年来，国内马来西亚政治研究迈上新台阶。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总的发展水平来看，仍然跟不上中马关系发展的需要。

（一）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研究手段有待提升

国内从事马来西亚政治问题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历史学、政治学或国际关系研

① 许利平：《“伊斯兰教国”课题困扰马来西亚政局》，《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2期，第45～47页。

② 范若兰、孟庆顺：《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国理念、实践与政党政治》，《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2期，第19～24页。

③ 许利平：《印尼和马来西亚民主化进程中的伊斯兰因素》，李文主编：《东亚：宪政与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④ 范若兰：《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页。

⑤ 同上，第283页。

⑥ 叶笑云：《“碎片化”社会的政治整合——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探析》，《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6期，第12页。

究领域的资深学者，具有较强的专业背景，擅长使用文献梳理、史料分析、对比研究等常规研究方法对马来西亚政治问题进行多维度剖析。鉴于马来西亚多元族群、宗教、文化的特性以及现代学术研究不断向交叉学科方向拓展的趋势，对马来西亚政治问题的研究必须借助更全面更完善的研究手段，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传播学等多领域的学科知识及现代科技方法，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很多学者在展开研究时，受时间、精力以及经费等条件限制，未能亲身前往马来西亚开展实地调查研究，使用的资料大多来源于网络、报刊或是东南亚某些国家的二手调研资料，也容易造成研究成果的空泛化。

（二）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研究体系有待完善

国内学术界对马来西亚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比较成熟，对华人学者的学术观点及研究成果参考借鉴的比较多，在研究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及其他社会问题时倾向于使用华人的视角，站在华人的立场上分析评述，而对马来西亚最大族群——马来人的研究相对较少，对马来语的材料解读不够充分，^①这必然会影响到国内学者研究成果的完整性。除马来人、华人外，马来西亚还生活着大量的印度人及原始土著人，目前这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与之类似的还有对西马地区的重视程度远超东马地区。随着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加速，东马地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这一地区政治权力结构、政治运作模式以及与东马政治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研究将提升对马来西亚政治发展整体情况的认知水平。

（三）研究课题过于集中，研究内容有待细化、拓展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者对马来西亚政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对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历程的整体性研究；二是对马来西亚政治发展模式及政治制度特点的研究；三是对马来西亚族群政治与政教关系的研究；四是对马来西亚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发展研究。同时，还有大量从事东南亚地区动态研究、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对马来西亚政局走势保持关注，在学术期刊及报纸、杂志上发表大量时评类文章。综合来看，无论是纵向考察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轨迹，还是探究其根源或内在动力，族群问题和伊斯兰教因素都是国内学者探讨的重点，这无疑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和问题的关键。但是，政治格局的演进必然有强劲的经济动力和强大的社会力量在推动，政治领导人的风格特点、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趋势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也不可忽视。因此，有必要就相关问题进行细化、拓展，以补充、丰富现有研究成果。

^① 林水豪、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会1984年版，第325页。

（四）成果质量参差不齐，理论化水平有待提升

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亚太地区的研究热度持续上升，马来西亚政治问题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加入。由于受知识面、科研能力以及资源、经费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现有的研究成果质量参差不齐。普及性介绍偏多，重点研究较少；宏观议论偏多，实证研究与具体分析较少；分散性的研究较多，系统性的论述较少；对政治发展的现象性描述偏多，对规律性的认识及理念的提炼较少。一些学者从资料分析入手，围绕马来西亚政治领域的特定问题展开研究，但理论思辨略显单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有待进一步提升。国内智库研究机构或是高等教育机构在开展研究时大多实行课题制，跨单位跨领域的合作交流较少，容易出现研究课题及研究成果的重复，不利于综合研究能力及整体水平的提升。

（五）对新事物、新趋势的敏感度较低，科研创新能力略显不足

在马来西亚政治转型日趋复杂的当下，政治领域的多元化趋势愈益显现，参政主体更新换代，参政方式及手段日新月异，这些变化趋势也对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内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马来西亚政治领域涌现出的一些新特点，积极关注新生代选民、非政府组织、女性群体的政治理念、政治主张、参政方式及进展，分析社交媒体的崛起和充满活力的网络社会给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①从整体来看，国内学术界对当前马来西亚政治领域的新事物、新趋势敏感度较低，对新课题的延伸拓展较少，相关研究成果尚不够丰富，科研创新能力略显不足，创新优势有待进一步挖掘与提升。

[责任编辑：王国平]

^① 参见王虎：《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范若兰：《伊斯兰女性主义探析：马来西亚伊斯兰姐妹的经验》，《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第80～88页；范若兰：《马来西亚华人女性权利参与试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1～10页；刘勇：《马来西亚净选盟运动及其影响》，《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4期，第34～41页；何春雨：《净选盟运动与马来西亚政治发展》，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陈文胜：《社交媒体与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4期，第11～28页；范若兰、饶丹扬：《新媒体与马来西亚净选盟运动》，《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5期，第71～92页。